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贝纳加(Nasser Behnegar) ● 著

施特劳斯、韦伯与 科学的政治研究

Leo Strauss, Max Weber,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陆月宏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s and Commentary

HERMES

刘小枫 主編



施特劳斯、韦伯与科学的政治研究

Leo Strauss, Max Weber,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美] 贝纳加(Nasser Behnegar) 著 陆月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特劳斯、韦伯与科学的政治研究 / (美) 贝纳加著; 陆月宏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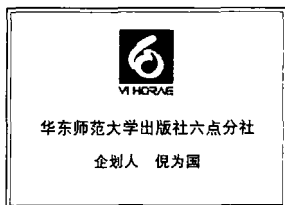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7353-6

I. ①施… II. ①贝… ②陆… III. ①施特劳斯, L. (1899~1973)—
哲学思想—研究②韦伯, M. (1864~192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59②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918 号



LEO STRAUSS, MAX WEBER,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by Nasser Behnegar

Copyright © 200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731 号

经典与解释

施特劳斯、韦伯与科学的政治研究

(美) 贝纳加 著

陆月宏 译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万 骏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353-6/B·518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接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前言

贝纳加的研究围绕着两个相关的主题，即社会科学的基础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主要通过细致解读那些探讨这两个主题的主要思想家的文本，来研究它们。这些主要思想家有尼采、韦伯、施特劳斯，还包括休谟、洛克等。最近几年，由于在伊斯兰政治哲学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上有所启迪，他对伊斯兰政治哲学也产生了兴趣。

一、引言

本书研究的主角是施特劳斯，即使对另一位重要人物韦伯的研究，也是在与施特劳斯相关的角度上进行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是美籍德裔犹太哲人。“哲人”前面的这几个前缀充分表明了施特劳斯人生与思想形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他曾经是海德格尔的学生，纳粹上台时离开德国，最终定居美国。他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主讲政治哲学。他的著述主要涉及柏拉图、阿尔法拉比(Alfarabi)、迈蒙尼德(Maimonides)、阿威罗伊(Awerroës)、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等

哲学家。他的一个怪异观点是,哲学家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迫害,不能显白地说话,而只能隐微地说话。这种说话方式的另一个原因是,真理对社会可能是危险的。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包括自由民主政体腐蚀了宗教信仰,导致了虚无主义,导致了狂热的蒙昧主义。在由此导致的所谓多元文化的平台上,意志强硬的人物与思想可能会占据统治地位。为了解施特劳斯的这些特立独行的观点,我们必须在心里记住他的多重身份与曲折经历。他的多重身份是:哲学家,犹太人,德国后裔与美国公民。他的曲折经历是:青年时期生活在最终失败和无能的魏玛共和国,目睹纳粹的上台和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经历了破坏性和规模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焦灼地感受到 20 世纪的一系列暴政(如希特勒等)对西方文明和宗教传统的威胁。显然,他的这些身份和经历正是他的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罗陀斯舞台。

施特劳斯之所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是因为它不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在关于最重要的问题方面不是精确的。他厌恶“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社会科学没有能够把诸如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类的政体理解为暴政。因此,他出于对真正社会科学的渴望,而转向了古典政治哲学。

当代人误解施特劳斯意图的最深刻原因以及克服这种误解的最大困难是,我们缺乏对他希望在古典政治哲学知识的帮助下予以回答的问题的意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相对主义问题。

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民主政体危机的最深刻原因是尼采对现代理性主义(或者说信仰)的批判。他在青年时代对尼采深怀感激,这不仅是由于尼采揭示了现代理性信仰的缺陷,而且是由于尼采开启了以焕然一新和非传统的方式重新考察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可能性,是由于尼采把苏格拉底关于最好生活的问题

恢复为真正的问题。这种对传统根基的非传统的重新考察,也许会导致这样的可能性,亦即领悟到最初为古典哲学详尽阐述出来的标准是合理公正的,领悟到理性生活确实是最好的人类生活。时代的问题在于,这种现代文明危机中的根本性困难是否获得了解决,或者纳粹的灾难性后果与自由民主政体对它们的胜利是否只不过遮蔽了这些问题。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施特劳斯的著作就依然将在未来闪耀着启示的光辉。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既然施特劳斯认为我们时代的危机是“刺激我们全面关注经典著作的诱因”(CM,11),那么在现代人普遍丧失危机意识的过程中,在普遍沉溺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就已经丧失了进入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解释的途径方法。

由于施特劳斯的方法截然不同于所有其他进行人文研究的当代科学和人文主义方法,所以,在没有深入思考对这些抉择产生的怀疑的情形下,人们就不可能对施特劳斯方法拥有严肃的兴趣。作者在第一部分揭示了这样的问题,亦即是否存在着能够满足政治科学希望的不同于施特劳斯的其它当代选择。本书的其余部分关注的是,重新考察施特劳斯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批判。他认为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根本前提,是事实与价值的分野(CM,11)。因为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韦伯评论是对这种分野的主题性处理,所以第二部分致力于解释这篇评论。他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分野“与对属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事物的那种理解背道而驰,但是,当科学理解取代公民对政治事物的理解之际,它看来就变得必不可少”了”(CM,11)。现代社会科学至为根本的断言是,对政治事物常识性的理解先行于科学确证这一点,在认识论上是毫无价值的。施特劳斯对这种断言的主题性考察出现在《科学的政治研究文集》(再版于LAM)的后记中,所以第三部分致力于解释这篇文章。上述两篇文章分属于

两部不同的著作,具有相当不同的意图。第一篇文章是《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第二章,这一章的目的在于展开需要进行大量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第二篇文章出现于这样一部专门用来批判新政治科学的书的结尾部分,并矢志于为那些政治科学家们提供实际引导。但是,施特劳斯显然希望读者一起阅读它们。“在这两篇文章的根基处,是相对主义问题,并由此是有关真正科学的可能性问题”(页5-6)^①。对相对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回应,人们可以拒绝它,可以欢迎它,也可以漠视它。但是,对进入施特劳斯的思想来说,仅仅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回应,亦即承认相对主义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社会科学与新政治科学

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局部溃败之后,兴起了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孔德认为,依据人民主权学说的现代政治哲学,成功颠覆了旧社会秩序,却未能产生把进步要求与秩序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面对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孔德坚决主张人们必须首先结束知性上的无政府状态,而新的社会科学对结束知性上的无政府状态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相信,现代哲学的一个部分——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的成功,有助于现代哲学经过神学和形而上学阶段而走向思想的实证阶段。孔德认为,这种模仿自现代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为社会重组提供了唯一可靠的基础。在这种重组中,社会科学家将占据从前在旧秩序中为牧师与在新秩序中为人民及其代表所占据的位置。这种社会科学相信,新的

^① [编按]指原书页码,下同。

利他道德将是使社会整合在一起的粘合剂。这样的一种社会科学将是哲学的圆满实现,因为通过这种科学,诸科学的同质性,亦即它们都是来自同一树干的分枝,将大白于天下。

但是,在韦伯的抨击之下,通过发现普遍的行为原理而消除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希望随风而逝,取而代之的是根本价值之间永恒和不可调和的冲突。

取代完善现代文明努力的,是对这种文明的蔑视。进步信念遭到了摧毁。由于民主变质为大众民主,导致民主信念遭到了重创。对公众意见的尊重变成了对它的蔑视,一种基于痛苦的历史经验的蔑视。

新政治科学崛起于 20 世纪上半期,它声称在不仅模仿现代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而且在确实奠基于其上的意义上,它要比孔德的社会科学更加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科学的突出特点是,韦伯对理性解决价值冲突的怀疑,与孔德对经验社会科学将解决基本社会问题的期待的结合。

新政治科学的这些关注新政治处境的观察,一开始就与对人性的新理解联系在一起。科学在所有形式中都暗示了人类的等级排序,这种等级排序是民主原理予以否定的。面对科学的等级排序与民主原理之间的冲突,新政治科学家们最初的选择是科学,而不是民主。在获得行为心理学支持的情形下,认为能够测度社会现象的信念,促使新政治科学家们认为,通过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就能够克服人类自然力量的限制。

新政治科学接受杜威对形而上学的拒绝,接受他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关注。

一种与唯有科学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意思混合在一起的对民主的含糊的进步理解,为新政治科学提供了支配

法则，即把宗教视之为迷信的坚定拒绝，对旧的严酷道德的拒绝，一种关于专注大众的物质需要优先于精神需要的意识，一种认为科学能够消除人类所有重要问题的信念。（页 15—16）。

新政治科学家虽然在这些方面都是韦伯的彻底对立面，但是他们却显然接受了韦伯的价值学说。随着新政治科学的日益发展，最初与怀疑民主同时存在的民主主义，逐渐压倒了那些怀疑。如果说第一代新政治科学家是关注克服民主缺点、修补民主的社会工程师，那么行为主义者就是没有在民主中察觉缺陷的理论家。

在新政治科学中，人们几乎看不到杜威对培养富有美德之人的关切，而看到的是这样的愿望：“通过使注意力离开曾经分裂人类的伟大的道德、宗教和政治问题，从而创造和平与自由的社会”（页 20）。因此，新政治科学相当于这样的努力，即捍卫现代文明原则，却没有充分满足对人类中高贵和崇高部分的关注与培养。新政治科学通过忽视人类行为中不确定的道德因素来推导行为法则，以服务于它的预测目的。但是，如果道德因素至少部分地决定行为的话，那么对它们的忽视就容易削弱我们甚至去对未来做出合理猜测的能力。

只要这种服务于目的的行为法则仍然是政治科学的目标，那么政治科学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就是可疑的。这意味着政治科学家身上的科学家角色容易遭到公民角色的抨击。

政治科学对民主道德的排斥，只不过导致了一种无意识的因而必然遭到遮蔽而不会获得考察的道德论，这种道德论心照不宣地把民主提升为类似于神圣机器的东西。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议题，是要更加深刻清晰地理解社会

科学问题。唯有理解了这些问题,人们才能着手思考,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否可能,或是否必需。

三、拒绝自然权利的后果

施特劳斯方法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他“认为科学无法确立有效价值判断的信念,与认为所有人类思想本质上是历史性的信念,已经削弱了政治理论真正目标的合法性,这个目标就是寻找有效的准则”(页29)。施特劳斯极其严肃地对待历史主义的挑战,他坚决主张政治哲学与历史主义水火不容。他认为,政治哲学的重大对手不是实证主义,而是历史主义。当代政治理论家相信人之历史性命题是真实的和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把变化看作为“自然的”发展,把自己的工作设想为以某种方式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继续。“相反,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变化是突变,是开启了深渊的突变。因此,他断言‘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简单延续……不再可能’(CM,2)”(页30)。

伯林由于把他赞成的准则的盛行程度夸大到几乎必然的程度,从而掩盖了准则的普遍要求与对准则的纯粹历史有效性的信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一来,他就模糊了我们拥有的自由。伯林思考方式携带着这样的危险,亦即绝对化当前流行的观点,假装人们生活在历史中的绝对时刻,从而可以拥有在历史性上相对却有效的规范判断。同时,由于未能建立理性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现代精神只有局限于容易获得其方法解决的问题上,才能支撑它的问题一解决定位。但是,只有当人们不再把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承认为问题时,这种对它们的漠然置之才是可能的。因此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就是:

消灭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声称例如像那些关注上帝、灵魂和正义的存在和性质的问题不仅是不可解决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页34)

如果说新政治科学家集中关注的是解决问题,那么与此相反,施特劳斯的政治科学却首先关注理解问题。他甚至声称哲学“正是真正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基础性的和全面的问题意识”(WPP,116;TM,14)。施特劳斯认为,那些可能会撕裂共同体的最深刻的政治争执,基于有关善和正义的争执:

一般而言,对实现一个确定目标的手段,人们总能一致,而目标却总是引起争议的,即我们总是仅仅在关于正义和善的事情上彼此争执,并与自己争执。(SCR,347)

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些政治争执。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倾向于忽视政治生活中自然会出现的问题。施特劳斯暗示人们,相对主义由于模糊人性观念的含义,从而削弱了对希特勒运动的抵抗。相对主义通过鼓励人们轻视道德和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导致了对非自由主义政体抵抗的弱化。因此,对希特勒经验的更加深思熟虑的回应,将重新评价自然权利和相对主义问题。

施特劳斯对韦伯的批判是,如果我们的目标选择是独断的、无根基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坚持一致性呢?韦伯的工具理性其实是一种这样的非理性,把我们“置于这样的人类处境中,当参与微不足道的事情时,是健全和冷静的;而当面临重大议题时,却像疯子一样赌博——零碎的健全与大批量的疯狂”(NRH,4)。

施特劳斯洞察到,主张必要之事就是尊重多样性或个体性

的自然权利观念,承受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因为“在对多样性或个体性的尊重与对自然权利的承认之间存在紧张关系”(NRH,5)。

当自由主义者不满于甚至是为自然权利最自由主义的版本对多样性或个体性所施加的绝对限制时,他们就必须自然权利与无拘无束地栽培个体性这两者之间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NRH,5)

而一视同仁地看待所有偏爱或选择的结果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出现。这种自由主义甚至将宽容这样的社会,亦即不宽容它和不宽容它想要去保卫的社会。

就这样,在我们的道德和政治需要与对自然权利的现代拒绝的合乎情理的结论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冲突:

我们培育的理性越多,我们培育的虚无主义就越多;我们就更不可能是忠诚的社会成员。(NRH,6)

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就是狂热的蒙昧主义。狂热的蒙昧主义首先是存在命题,它断言世界之根本不可理解。它拒绝与之相反的科学和哲学命题。狂热的蒙昧主义是这个命题的必然结果,这个命题认为真正的选择是坚定的决定。这种坚定的决定是唯一具有建构相对主义标准的潜能的观点,是唯一有海德格尔才充分地将之实现的观点,因为他是唯一以彻底方式建构历史主义的思想家。导致狂热蒙昧主义的问题乃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后果与社会生活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不是被理解为人與人相处的需要,而是被理解为献身于共同体的需要。这种紧张关系不可能获得解决,并因此容易遭到那些

不愿意放弃现代个人主义的人的遮蔽。

由此可见,对现代自然权利的拒绝会导致狂热的蒙昧主义。施特劳斯声称,尽管康德和黑格尔努力恢复古典政治哲学的高贵道德,但是他们却接受这种错觉,即通过“盲目的自私的激情”可以实现道德秩序(WPP, 53—54)。这充分表明了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些哲学家的人义的、理性自主的、自我掌握命运的和建立人间天堂的基本思想倾向。

施特劳斯通过指出现代自然权利在狂热的蒙昧主义中达到了顶峰,从而促使我们思考,如果人们无法根据认为自然始终是个体的那种自然理解来确立自然权利的话,那么唯一潜在地向我们敞开的自然权利学说无疑就是古典自然正确学说。

他指出,古典自然正确是与目的论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宇宙观如今遭到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羞辱。如果我们因为它与陈旧的目的论宇宙观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回到古典自然正确,如果现代自然权利最终通向虚无主义和狂热的蒙昧主义,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落得一无所有。

相对主义主张规范知识是不可能的,由此导致的绝望使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变得更加困难重重。对获得有效道德知识的绝望,已然促使社会科学家以道德论证为代价,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经验材料。历史学家在解释文本的时候,与其说他们关注的是论证的合理可靠性,倒不如说他们关注的是文本的历史情境。“把我们从绝望中摆脱出来的唯一方式,是找到希望的理由,在今天,我们唯有把相对主义追究到底,才能找到这些理由”(页61),只有勇敢地领悟到所面临的困惑混乱,才能认识到仍然向我们敞开的可能性。

四、历史主义、虚无主义与对韦伯的批判

施特劳斯指出,当代人“以历史之名与事实和价值的分野之名”(NRH,8)拒绝了自然正确。如果“实证主义必然会自身转变为历史主义”(WPP,25; NRH,36—37),那么历史主义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分野,看来就只不过是同一种根本性困难的不同反应。

在最激进的历史主义中,也就是说,在对遗忘永恒观念的明确无疑的谴责中,现代思想达到了顶点,达到了最高的自我一意识。因为遗忘永恒,或者换言之,疏远人类最深沉的渴望并随之疏远原初问题,是从一开始——现代人为了努力成为绝对的最高统治者、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与为了征服偶然性——就必须付出的代价。(WPP,55)

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晰地聆听到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之遮蔽与技术之胜利的论述。

施特劳斯通过探讨历史主义与事实和价值之间分野的关系,引入了他对韦伯的分析。由于历史主义拒绝了充分意义上的哲学的可能性,从而拒绝了自然权利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作为事实和价值之间分野的基础的立场虽然拒绝了自然权利,不过却没有拒绝哲学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自然正确的原因,是他们主张在最终价值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

如果哲学生活是最佳生活方式,那么正确的政治秩序毫无疑问就是引导人们瞄准这种生活方式的秩序,是一种哲学在其中具有决定性话语权的秩序。基本的政治问题就是有关谁应该

统治社会的问题,而有关基本政治问题是否容易受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影响的问题,依赖于苏格拉底答案的公正性。苏格拉底答案的困难在于,它认为寻求智慧是最佳的生活方式,而同时却展现出这样的可能性,亦即获得智慧可能会导致拒绝认为哲学生活是最佳生活方式。苏格拉底答案无法战胜“反—苏格拉底答案”的事实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亦即这两种抉择之间的持久冲突无法获得解决。施特劳斯由此断言,许多当代社会科学家拒绝自然正确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变的权利或善的原理,这些原理彼此冲突,却没有一种原理能证明是高于其他原理的”(WPP,36)。

我们面对社会现象产生的问题,依赖于我们兴趣的导向或我们的观点,而这些又事实上依赖于我们的价值观念。但是,由于价值观念根据历史性来说是相对的,所以社会科学的内容就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野,是一种把科学的客观因素或超历史因素与它的主观历史性的相对因素区分开来的努力。

但是事实上,韦伯对历史主义的质疑是半心半意的。韦伯之所以无法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科学观念或经验科学观念,是因为他领悟到,所有科学都预先假定科学具有价值,而这种预先假定从历史上来说是相对的。如果科学价值是某种超历史的事物,那么献身于科学观念也许就是可能的。韦伯实际上主张,具体和历史的价值观念包含着超历史因素:“根本价值就像逻辑原理一样是永恒的”(WPP,39)。

正是奇特的永恒价值观念——而不是他对永恒逻辑法则的接受——极其意味深长地把韦伯的立场与历史主义区分了开来,而这种观念背后的首要动机正是韦伯对一般科